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六期／民國 94 年 12 月／頁 175～222

理性選擇、民主制度與「操控遊說」：William H. Riker 新政治經濟學的回顧與評述*

陳敦源、吳秀光**

摘　要

威廉・瑞克（William Harrison Riker, 1920-1993）是二十世紀美國最重要的政治學者之一。他創造的「實證政治學」（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給學界帶來了典範革命，他建立的「羅徹斯特學派」（Rochester School）徹底改變了二十世紀政治學研究的風貌；然而，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 RCT）日漸茁壯的「霸權」態勢，也讓美國政治學會在二〇〇〇年產生了「改革」（Perestroika）的呼聲，學界內的學術論戰與資源爭奪正式檯面化，爭議至今未歇，而這爭議的暴風眼就是 Riker 終其一生所建構的「新政治經濟學」（modern political economy），值得台灣學界重視。

本文將以文獻回顧的方式，完成下列三項內容。其一，從原始著作、學者評論、與訪談資料當中，回顧並重構 Riker 學術生涯的主要貢獻，提供台灣學界對其完整的理解。本文將 Riker 的學術生涯作時間與內容的劃分，重點式地探索他主要的論述與思想的轉折，其中特別著重在理

* 本文較早版本曾經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所主辦「政治經濟學：哲學、制度與政策的對話」學術研討會（台北市：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國際會議廳，2003 年 9 月 27-28 日），感謝東海大學王業立教授、政治大學黃東益教授、世新大學黃德北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稿人所提供寶貴的意見，然而文責仍由作者自負。兩位作者願意特別提出，本文在 Riker 教授逝世十週年（2003）完成初稿，主要是爲了向這位曾經啓發我們研究政治興趣、打開我們觀察民主政治眼光的學術導師，獻上最誠摯的懷念與謝意。

**陳敦源爲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專任副教授，e-mail: donc@nccu.edu.tw；吳秀光爲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專任教授。

收稿日期：94 年 7 月 15 日；通過日期：94 年 11 月 9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性選擇、民主制度、與「操控遊說」（Heresthetics）等概念的緣起與發展。其二，對 Riker 新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應用，提出討論與評述。本文將以競爭、忽略與接觸等三個學派發展策略爲討論核心。其三，從 Riker 新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台灣民主發展的研究，提出一些可能的方向。

無論 Riker 的思想在政治學界引起多少爭議，RCT 已成政治學研究重要的「選項」（alternative）是不爭的事實，爲了因應該研究途徑未來在台灣的發展，本文藉由回顧 Riker 的新政治經濟學，協助台灣學界掌握當代政治學中 RCT 的應用基礎，並對實證政治學、新制度論與政治的經濟分析等當代政治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提供從 Riker 教授思想源頭的整理，因此，本文將有助於台灣政治學界理解並應用 RCT 的作爲，離開過去「進口的假對話」狀態，對本土政治學研究產生實質影響。

關鍵詞：威廉・瑞克、理性選擇、新政治經濟學、操控遊說、民主理論、新制度論、實證政治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　言

> Riker 教授曾說，政治學界是一艘快沉的船，而理性選擇學派是唯一能夠拖著它回港的牽引船；我認爲更眞實的情況是，Riker 教授與他的使徒們，像海盜一樣像想要劫持這艘船到一個無趣的小島上，這些人的海盜行爲絕對不會成功，除非他們用槍抵著我們，否則政治學絕對不會成爲一種「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
>
> -- Gregory Kasza[1]

> 羅徹斯特是一艘母船，我們都愛稱 Riker 教授是「Riker 艦長」，而稱母校是「羅徹斯特號」太空船。
>
> -- Kenneth A. Shepsle[2]

公元二〇〇一年美國政治學會第九十七屆的年會在舊金山舉行，一群自稱推動「改革」（Perestroika）的政治學者齊聚一堂，對美國政治學的發展環境提出了嚴厲的批判。這個運動在二〇〇〇年十月間由一位自稱「改革先生」（Mr. Perestroika）的政治學者，發出的網路匿名信所引爆的，信中認爲美國政治學發展，出現了危機，不論是學會還是學刊，都被「一小群教授」（a coterie of faculty）所把持；這封信在網路流傳了一年多以後，二〇〇一年會上兩百餘位政治學者連署了一封公開信，呼籲美國政治學會應該進行立即的改革，這封以被壓迫者口吻撰寫的匿名信，對學界中「少數霸權集團」提出了毫不留情的攻擊：「當人們被推到了牆角，領導者要下台，政權要垮台，國家要改變！」

---

1 美國政治學會「改革」運動的參與者，引自 Kasza (2001)。

2 美國哈佛大學理性選擇學派政治學者。訪問內容引自 Cohn (1999)，原文如下：… “Rochester is the mother ship.” Shepsle says. “Its founder…was William Riker, ‘Commander Riker,’ as we like to refer to him. And ‘Starship Rochester.’”。「Riker 船長」是美國 1990 年代初知名太空探險電視影集「星艦迷航：新世代」（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中的副艦長名，其英文名字也是 William Rike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此，美國政治學會的學派爭鬥正式浮上檯面，親改革立場的歷史結構論者 Theda Skocpol 當選會長，不但在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上，開放一個討論區專門討論 Perestroika 的意義及影響，[3] 更於二〇〇三年創刊了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的期刊，目的是要建構一個跨越內部方法論、外部學門的橋樑，讓政治學研究不只是專業的形式理論與統計學者才看得懂的讀物。[4] 紐約時報稱這是一場「不玩數字」與「玩數字」學者之間的戰爭（pro-number versus non-number folks）（Eakin, 2000），高等教育新聞也稱這爲一次學門內的革命，目的是爲了要反抗過去二十年以數理研究爲導向的發展（Miller, 2001）。學者 Dryzek (2002) 認爲，這個改革運動有兩個特色，一是沒有人反對改革者所言理性選擇學派（rational choice theory；後文以 RCT 代替）「把持」學界的現況，但是，另一個特色是 RCT 的人，對於爭議並沒有積極的回應。[5] 無論如何，而這爭議的暴風中心，就是學者威廉·瑞克（William H. Riker, 1920-1993，後文以 Riker 稱之）終其一生所試圖建構的新政治經濟學。[6]

3　發行於 35 卷第 2 期，2002 年 6 月號，總共有九位政治學者提出他們對「改革運動」的看法，另外，一本以這個運動爲主軸的論文集也於 2005 年發行，請參 Monroe (2005)。

4　主編哈佛大學的教授 Jennifer L. Hochschild (2003) 在發刊詞中說到：「我們的目的是要讓政治科學家與其他人能夠從享受閱讀當中得到啓發，一方面吸引學門外的人，一方面也在學門內激發出對話與全新的觀念。」事實上，這個新刊物的概念，早在 2000 年年會上（也就是改革者的 e-mail 發出之前），由美國政治學會的策絡規劃小組提出，當時已經了解到 APSR 內容逐漸偏向量化的取向的事實，因此，該小組希望能建立起一個類似經濟學門中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的期刊，稱爲 *Journal of Political Literature*，但是卻考慮到經費的原因而擱置，請參 APSA (2000)。

5　事實上，這兩種情況都是可以理解的。首先，RCT 在目前美國政治學界的影響力，是無庸置疑的，除了傳統選舉研究及國會研究的範疇，RCT 已經成爲主流之外，國際關係甚至是比較政府領域都出現了他們的蹤影，而傳統政治哲學中民主理論的領域也受到 RCT 的影響，如果我們比較「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分別在 Finifter (1983), Finifter (1992), Katznelson and Milner (2002) 所出版的三本學門現狀專書中，可以看見理性選擇學派過去三十年在學門內逐漸增溫的影響力。再者，而 RCT 學者面對批評時，對批評者常有「在玻璃屋中扔石頭」（Many who throw stones at formals models reside in glass house.）的看法（Fiorina, 1975: 139），也就是批評者「不能用空泛來打擊實體」（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加上目前 RCT 的學者在期刊及工作職場上都是勝利者，對於方法論多元主義的呼聲從來沒有反對過。

6　學界對於這一群人有不同的稱呼，可約略分爲六種。其一，最普通的就是「理性選擇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學界對於 RCT 的批評從來沒有間斷過，主要可以分爲三個重點：其一，學者針對經濟學門在社會科學界科學化領導地位的質疑，本土學者通常藉由與「改革運動」相同的語言爲之，攻擊「經濟學帝國主義」（economic imperialism）（Radnitzky and Bernholz, 1986）在其他學科的「肆虐」，如黃世鑫（2002）；若以公共行政學界爲例，學界內以「公共性」（publicness）排拒經濟理性的研究方法就是一例，如吳瓊恩（1999）、許世雨（2001）；其二，上述這種反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呼聲，也常常與台灣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呼聲遙相呼應，本土研究注重歷史系絡、個案特殊性的思考，常常被放在與國際化、通則尋找的對立面來思考，如蕭全政（2000）、吳若予、蕭全政（2002）；[7] 其三，就純方法論的討論

派」（rational choice school）或是「理性選擇理論家」（rational choice theorists），這是因爲他們對人類行爲的假定，是依循自利（self-interest）及效用極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這些理性的定義，本文也將使用 “RCT” 爲代表稱呼；其二，這些學者喜歡稱自己的作爲是「實證政治學」（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Fiorina, 1975; Riker and Ordeshook, 1973; Austen-Smith and Banks, 1999, 2005），這是取 Milton Friedman 實證經濟學的類比（positive economics）（Friedman, 1966），也有聲稱自己是研究「是什麼」（what it is?）的實證問題、而非規範性問題的意義；其三，由於這群人常常使用以數學語言爲主的「形式模型」（formal model），學界也稱他們爲「形式模型建構者」（formal modelers），根據 Rebecca B. Morton (1999: 61) 的定義，形式模型是：「由一組精簡的假定以及定理對眞實世界的描繪，通常以數學符號表達，其求解的過程是針對眞實世紀進行理論預測的活動（a set of precise abstract assumptions or axioms about the real world presented in symbolic terms that are solved to derive predictions about the real world.）」；其四，這些學者有時也自稱或是被稱爲「羅徹斯特學派」（Rochester School）（Dryzek, 1992; Schiemann, 2000; Amadae and Bueno de Mesquita, 1999），因爲該學派是在美國紐約州的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發跡的；其五，學界也有直接以「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來稱之（Riker, 1988），Riker 也曾經是美國「公共選擇學會」（Public Choice Society）創始會員之一；其六，學界也有使用「實證政治經濟學」（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Alt and Shepsle, 1990）或是「新（現代）政治經濟學」（modern political economy）（Banks and Hanushek, 1995）的名稱，來稱經過實證政治學發展洗禮之後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最後，關於 RCT 與計量研究的關係，基本上計量研究也是 RCT 概念中科學研究重要的一環，但是，若與密西根學派（Michigan School）社會心理調查的研究比較起來，RCT 更重視統計檢定前，導出假設背後理論的邏輯分析，因此，RCT 處理的是比計量研究更前端的東西，計量只是理論推導出研究假設之後，做經驗驗證必備的工具。

[7] 經濟學者朱敬一與政治學者蕭全政在中國時報的時論廣場上，對於台灣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問題，有一段精采的對話，請參朱敬一（1998）、蕭全政（1998）。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來看，也有政治學者以文本分析的方法，質疑政治學過份計量經濟化的問題，如徐振國（2002），可以說是從傳統量化與質化分野，討論政治學研究方法的一個切入點。當然，台灣學界也有對 RTC 持樂觀審慎態度的學者，包括林繼文（2001）、吳秀光（1998、2000）、盛治仁（2002）、陳敦源（2000a、2002）、謝復生（2000）等，對 RCT 在政治學門的推廣，不遺餘力。有趣的是，上述方法論的論戰，如果以台灣公共行政學門爲例，學者孫同文（1998）的研究指出，學界在口頭上非常排拒「實證主義」（positivism）；但是，從一九九〇年以前的學術期刊發表當中統計，真正所謂實證的論文是少之又少，林繼文（2005）對台灣政治學門一個回顧性的研究中，也得出類似的結論，從這個事實看來，對於實證主義的攻擊，只能說是一種「進口的假對話」（imported pseudo-dialogue），也就是說，攻擊的對象在台灣並不存在！嚴格來說，台灣政治學門當中，以 RCT 進行模型建構的研究，仍然是少數中的少數，並未形成如美國政治學界的霸權態勢，反倒是統計計量方法，因爲選舉研究的興盛，而有類似的霸權的態勢；然而，本土對於實證主義的批評，常常無法分辨計量方法與 RCT 形式模型（formal modeling）的差異，以至於批評在台灣較弱勢的 RCT 多，但是檢討計量方法的卻少的現象，[8] 與美國政治學界的現況剛好相反，[9] 更重要的，因爲這樣的批評，讓台灣學界無法有系統地一窺美國 RCT 霸權態勢的真正內涵，殊爲可惜。

本文的目的有三。首先，從了解 Riker 一生的研究內涵，對 RCT 進行更深入的理解。台灣學界對於 RCT 雖然有涉獵，但是對其影響政治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並沒有全面性的了解，本文分理性選擇、民主制度以及操控遊說等三個方向，對 Riker 的研究作有系統的引介，將有助於台灣學界從這位學派「掌門人」的研究文獻當中，了解 RCT 的內涵，本文認爲學界持

8　批評「人是理性」的假定（assumption），直覺上較容易引起共鳴，但是要批評一個計量模型，比方說 Logit 模型的測量誤差問題，除非受過適當的多變量統計訓練，勢必難以啓口。

9　美國政治學會的改革運動，事實上也包括對計量統計的攻擊在內，但是由於 RCT 從方法論的檢驗角度，有包括計量的方法在內，但是計量方法並未包括 RCT 的理論建構，因此，改革運動仍然將計量方法當作是 RCT 的一部份。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續停留在「人是否是理性」、或是「量化 vs. 質化」、「本土化 vs. 國際化」等面向上檢視 RCT，反而會失去接近 RCT 對當代政治學核心貢獻的機會；再者，上述 Riker 的研究重點，從學門的發展來看，剛好符合學者 Mark I. Lichback (2003) 對 RCT 發展過程中，「競爭、忽略與融合」（competing, ignoring, and synthesizing）三種策略的描述，這三種策略所產生的結果，對學界目前發展各有其重要的影響，本文將這個影響有系統的發掘出來。最後，從 Riker 新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台灣民主發展研究，提出一些可能的研究議程。

貳、William H. Riker：人與思想[10]

西元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生於美國愛荷華州 Des Moines 市，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因癌症病逝於紐約州羅徹斯特市，[11] William Harrison Riker 成長在一個書商之家，從小就對閱讀產生極大的興趣，他父親對於平衡與客觀的評論觀點有特殊的偏好，也因此影響了他思考的方向。他求學期間，被同學稱爲一個獨立的怪人，尤其在哈佛大學讀政治學博士的時候，對於當時政治學所學習的主流內容，心生不滿。Riker 在一九七九年接受美國政治學會的口述歷史訪問時說，他並不認爲在哈佛的老師們，給了他研究政治現象什麼清楚的引導，他甚至認爲，那些老師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他談到一位頗負盛名，同時也是自己指導老師的 Carl J. Friedrich 教授，說他只專注在要求學生了解美國某一段歷史當中政治理念的形成圖像，但是卻不知道要如何拿這些資料來了解政治的本質，Riker 說：「他好像是將政治學研究的功能，當作是每一到兩年出一本書罷了……」。[12]

這樣的心情，讓 Riker 認定必須要自行創造一個研究方向，追尋心目中

---

[10] 本節關於 Riker 個人的一些描述，來自於 Shepsle (2003), Amadae and Bueno de Mesquita (1999), Bueno de Mesquita and Shepsle (1993) 以及作者個人記憶的總和整理。

[11] 紐約時報當時報導他去世消息的標題爲：「用數學來分析政治的 William H. Riker 先生，享年七十二歲」（William H. Riker, 72, who used mathematics to analyze politics）（Saxon, 1993）。

[12] 請參 Shepsle (2003)。美國政治學會的口述歷史（the APSA Oral History Project），目前收藏於美國肯塔基大學圖書館當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認定的政治科學研究。他從哈佛畢業之後，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在 Lawrence College 待了十年的時間，期間他不斷搜尋建立新政治學的基礎文獻，從兩位蘭德公司（RAND）的學者 L. S. Shapley 與 M. Shubik (1954) 所發展出來的「權力指標」（power index）之中，Riker 嗅到不同於傳統政治學者談論權力的味道，他從此開始挖掘第一代 RCT 論著的旅程，包括 von Neumann 與 Morgenstern (1944) 所著賽局理論的經典作品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3]、D. Black (1948) 對於多數決穩定原則發現的著作、Kenneth Arrow (1963) 所著社會選擇理論的原典論著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以及 A. Downs 應用空間理論討論民主決策的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等著作，Riker 站在這些 RCT 巨人的肩膀之上，一步一步地建立心目中的新政治經濟學。

一九六三年，Riker 被位於紐約上州的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看中，負責開闢一個新的政治學系，當時羅徹斯特大學決定不建立一個法學院，而要建立一個具有未來性的政治以及經濟學系，嚴格來說，當時的主事者希望應用物理學的科學方法，從事社會科學的研究，Riker 的努力，被當時學校方面注意到了，成爲最主要的邀請對象。在一份寫給學校的建系計劃當中，Riker 寫到：[14]

> 我所建構的是一個能夠與現在那些一流系所一起創造政治學門的學系，……這個系的主要課程將有兩個方向的重點，其一，客觀地驗證政治理論的內涵（比方說，政治行爲），其二，實證主義（非規範性）的政治學。

Riker 接受羅徹斯特大學邀請創建美國第一個以 RCT 爲核心的政治學系，成爲 RCT 發展最關鍵的一步。[15] 他不但讓博士班學生必須接受經濟數

---

[13] 根據 Amadae and Bueno de Mesquita (1999: 289-292) 的說法，Riker 發掘並應用賽局理論，比經濟學界接受賽局理論還要早，他們將此當作反擊政治學界接受「經濟學帝國主義」說法的證據，早期發展實證政治學的過程當中，沒有經濟學者的參與。

[14] 本段建系歷史請參 Amadae and Bueno de Mesquita (1999: 278-281)。

[15] 這個機會是來自於羅徹斯特城的全錄公司（Xerox Corporation）在 1960 年初捐了一筆錢給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指定要提升該大學的社會科學研究所教育（Amadae and Bueno de Mesquita, 1999: 279）。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包括賽局理論）的洗禮，也說服學校當局讓統計計量訓練取代博士生的第二外國語文學習，自此，Riker 不但有屬於自己的政治學想法，也擁有一個訓練「使徒」（disciples）的場所，開始一步一步影響美國政治學門的未來發展，以至於在四十年後，成爲政治學的主流方向之一。

根據 Maske 和 Durden (2003) 的統計，Riker 一生一共發表了 15 本書、69 篇學術論文；從一九七二年到二〇〇一年，他的著作總共被二〇〇〇位不同的學者、在 500 種不同的期刊上、引用了將近 3,700 次，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他一九六二年著名的「政治聯盟理論」（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一書，總共是 664 次，平均一年 17.5 次，他在最頂尖的「美國政治學刊」（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所發表的論文數（從一九五二到一九八七總共 16 篇），至今無人能出其右（Miller, Tien, and Peebler, 1996），他是公共選擇協會（Public Choice Society）的原始創辦人之一，也曾擔任美國政治學會第七十八任的會長，更於一九七四年獲選爲美國國家研究院的院士（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16] 對當代的政治學界來說，不論從教學、研究、或是學界服務的角度來看，Riker 是將理性選擇理論有系統地引進政治學分析的第一人。[17]

---

[16] 更重要的，在政治與社會科學的分項當中，Riker 有三位學生也前後獲選爲院士，包括 Kenneth A. Shepsle（1990 年當選）、Richard D. McKelvey（1993 年當選，2002 年過世）、and Morris P. Fiorina（1998 年當選）。其他與 RCT 有關的院士包括：Robert Axelrod（1986 年當選）、John Ferejohn（1988 年當選）、Brian Skyrms（1999 年當選）和 Elinor Ostrom（2001 年當選）。

[17] 兩位匿名審稿人都不約而同地討論到 Riker 與 RCT 學派的對照關係，Riker 是否獨立創造了政治學門中的 RCT？我們的答案是「是」也「不是」，理由如下。如果說 RCT 在研究政治問題的起源，Riker 絕對不是第一個提出這種看法的人，Riker 本人曾經在課堂上說過，Hobbes 的《巨靈》（*Leviathan*）一書的開頭，以物理學的論證方式來建構對於社會的理解（一種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操作），是激發他應用科學方法研究政治現象的源頭之一；另外就是本文文內所提及的這些思考集體決策問題的經濟學家，在 Riker 早期應用實證方法分析集體決策問題時也有決定性的影響，但 Riker 本身並未創造下面這些重要的理論，包括 Kenneth Arrow 的投票矛盾的分析（社會選擇理論）、公共選擇學派討論政府失靈、賽局理論研究均衡行爲預測、以及組織經濟學討論委託人代理人關係與組織管理（或是寇斯經濟學）等。事實上，眞正由 Riker 所主導的只有實證政治學（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一途。但是，就是因爲 Riker 所建立的實證政治學，這些在傳統政治學研究之外，與政治學研究問題相關的 RCT 發展，在政治學門內找到了聯結的對口單位，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除了是一位對政治學門發展有願景的人以外，Riker 也是一個精明、誠實且和藹的系所建立者。[18] 他以自己的論著爲例子，啓發學生發展比自己更複雜的理論，在數學工具訓練上，Riker 遠不如許多他所精心挑選來的學生及同僚，但是，他對政治現象的直覺取景與邏輯分析，卻能帶領整個 RCT 的發展，也讓羅徹斯特學派在數十年以後，以相對較少的人數，[19] 佔有被反對者稱爲「霸權」的地位，從這種學派策略性發展的歷史來看，正是 Riker 自己驗證自己所建構理論的最佳寫照。接下來，本文將從理性選擇、民主制度與操控遊說等三個方面，來更深入的了解 Riker 近半世紀的學術生涯（1949～1993），給政治學門留下了些什麼。

而有了內外交流的可能，這也間接造成目前政治學門內 RCT 多元發展的基礎。舉例而言，對於官僚體系政治控制問題的研究（或是國會與行政部門關係研究），近來是由 RCT 引進「代理人理論」（agency theory）爲發展的主軸，相關研究發展請參 Moe (1984)、Miller (2005)。當然，至於要如何論斷 Riker 的學術成就到底有多崇高的問題，本文就留給讀者自己判斷了。

[18] Riker 的和藹與風趣是他學術成就之外最讓人懷念的地方，他喜歡在研究室大門貼上一些自己或是他人的雋語，活化系上的思考風氣，還有就是他那色彩艷麗、但從來不重複的領帶，都是強調競爭性的學界當中讓人感受到人性溫暖的地方。約在 1990 年左右，一位署名無名氏的研究生在 Riker 的研究室大門上貼了一個形容 Riker 的英文詩，一直受到 Riker 的鍾愛，後來這首詩也被印在他追思禮拜的本事上，成爲形容 Riker 這個人的最佳寫照，該詩的英文原文如下：

Riker
Teaching, ever reaching.
(Preaching?), always kind.
Clever fellow,
Ever mellow.
His the tie that blinds.
Oh so witty,
Writes a ditty,
Posts it on the door.
Strange perspective.
History detective.
Makes us beg for more
- *Anonymous*."

[19] 在 1997 年，美國政治學會當中，參與實證政治學次團體的會員有 337 人，佔全部會員 7505 人的 4.5%，是非常小的團體，請參 Miller (1997: 11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理性選擇

Riker 給政治學門所留下最大的資產，就是創造一個以科學化理論發展爲主的學派，這方法論上的創新，讓政治學界產生新的進步動能，當然，這樣也讓政治學界中，方法論上的爭議更加檯面化。從初級政治學教學中，政治學是否是「科學」的問題，一直存在爭議，然而，對反對政治學科學化的人來說，這個爭議在行爲主義興起之前，一直是一場「沒有敵人」的論戰，也就是說，政治學內科學研究的內涵，尚未建立。Riker 在哈佛大學攻讀政治學的歲月中，對於當時以歷史及正式制度的比較研究十分不滿，很早就想以科學化的方式，針對學界的主要問題進行理論建構的工作。一九六〇至六一學年，Riker 接受普林斯頓大學高等行爲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一年研究的獎助，在他的申請書當中，對於實現政治學科學化的理想，已經有這樣的描述，這個願景在 Riker 往後三十餘年的學術生涯逐步實現：

> 我看見政治學可以像新古典經濟學的價值理論一般，發展出屬於自己的一套理論，我認爲從數理賽局理論所推論出來的一組定理，可以與政治學研究作一個結合，因此，我目前的興趣就是應用賽局理論來建構政治理論。[20]

在「標竿領導」（leading by example）的意念之下，Riker 利用受邀在 Princeton 的一年間完成了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政治聯盟理論》（*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Riker, 1962；袁頌西，1971），讓當時主流學界能夠一窺 Riker 心目中的政治科學研究的內涵。該書第一章〈政治科學的展望〉（The Prospect of a Science of Politics），可以說是 Riker 第一次較有系統地，對政治學科學研究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提出他的看法。他對於政治科學缺乏系統化理論的現狀，提出強烈的質疑，[21] 而他心中所嚮往的政治

---

[20] 請參由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和 Kenneth Shepsle (1993) 爲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所撰寫 Riker 教授的生平紀念文。

[21] 這個部分在他稍後的一篇談論政治科學研究的文章當中，有更完整的描述，文中爲了向讀者展現這種發展的可能性，也特別挑選「杜佛傑法則」（Duverger's Law）、「中位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理論（political theory），是在某些前提之下，[22] 經過嚴謹的演譯邏輯推論出來，一組「可驗證的」（verifiable）定理所組成，而這些定理經過經驗資料驗證去蕪存菁的篩選之後，就逐漸累積成爲可以用來解釋及預測政治現象的知識，而這些知識也是有實用性的。[23]

再者，這樣的理論建構，Riker 吸收了經濟學與心理學理論發展的精神，接受「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將個人視爲基本「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以此建構解讀政治現象的理論；但是，這種解讀需要一個模型內部的行爲假設，作爲推論的動力，「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成了當然的選擇，Riker 的選擇與他早期接觸到 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 (1944) 所發展出最早期的賽局理論，有很大的關係。他認爲（Riker, 1992b: 209-210），賽局理論當中一方面對人類理性有固定的看法，讓極大化結果成爲行爲人最重要的動機（邏輯上決定性的因素），而另一方面又讓人有自由選擇的意志，符合實際政治互動當中個人策略技巧（savvy）的展現，這種結合行爲假定與決策自由的研究架構，成爲一種「鑲嵌自主」（embedded autonomy）的行爲分析架構，讓政治學研究有一般化的可能；[24] 但是另一方面，因爲「自由選擇」（free-will）的

選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最小勝利聯盟」（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等三種一般化的政治學法則爲例，認爲他們是發展「定理政治學」（axiomatic politics）的基礎，請參 Riker (1977)。

[22] 這些前提就是理性選擇的前提，主要是以個體經濟學爲師的分析性基礎，關於理性選擇理論與政治學研究的回顧性文章，請參 Morris and Oppenheimer (2004), Miller (1997), Riker (1990)。

[23] 在一篇評論文章當中，Riker 將這種理論建構途徑視爲包括定理、演繹推論、經驗檢定等三個部分，請參 Riker (1965: 377-378)。在 Riker 的心目中，一般化的理論是當代政治學最缺乏的內涵，以至於讓學者無法有系統地了解週遭的政治現象。他認爲，一般化理論在政治科學的發展當中，至少有三項功能（Riker, 1992a: 5-6），其一，理論協助「描繪」現象，特別是那些已經經過經驗驗證的一般化理論，更是描繪政治現象的精華，其二，這些經過驗證的理論，進一步可以協助研究者「預測」政治現象，其三，這些描繪與預測政治現象的理論，讓社會改革者可以從更務實的角度來選擇「可行的」改革方案，而不是「應該作」的方案。

[24] 這個名詞是借用學者 Peter Evans 對於國家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描述，如果放在政治學研究上，也頗能傳神地描繪出理性選擇理論試圖理解世界的基本模式，請參 Evans (1995)。

臺灣人文及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存在，又讓一般化的努力不易達成，社會科學的本質，就是在「行爲常態」（behavioral regularities）當中尋找一般化的理論，但另一方面，也必須在理論世界當中，允許人使用自由意志，而賽局理論就是結合這兩種看似衝突的面向，是分析政治現象最好的工具。

在這樣的認知知下，Riker 應用賽局理論的早期論述，建構一個實證的聯盟理論，並提出一個一般化的「規模原則」（size principle），這也就是常被稱爲「最小勝利聯盟」（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s）的一個觀察聯盟現象的原則，Riker 對該原則的陳述如下：[25]

> 在多人、零合的賽局當中，當獲利轉換（side-payments）可能、參與者是理性又具有完全的資訊的前提下，只有最小勝利聯盟會成立。

這樣的一個選題的背後，是來自於 Riker 對於政治學界流行的政治定義—David Easton「價值的權威性分配」的一個反應（Easton, 1953），他認爲 Easton 所言這種分配的內涵，絕對不是物質的分配而已，而是以自利的個體（個人或政黨），在特定遊戲規則之下，所爭取來的勝利果實。這樣的想法，讓 Riker 對在民主遊戲規則之下，個體如何集合起來，獲取以及分配勝利果實的問題，產生興趣，而這也是他相對於 Shapley and Shubik 靜態的「權力指標」（power index）（Banzhaf, 1965；Shapley and Shubik, 1954），所提出的一個解釋與描述權力分配的動態論述。

讓我們試舉一個小例子，從直覺來理解「規模原則」的內涵。假設今天有五個人要分三個單位的貨幣，其分配的方法就是多數決，能夠加入多數聯盟（勝利聯盟）的人，可與其他加入多數聯盟的個人，共同獲得三個單位的貨幣，而其他沒有加入勝利聯盟的，就必須共同湊出三個單位的貨幣給勝利團隊，在這樣的狀況之下，Riker 預測，只有最小勝利聯盟會出現。一個人的團隊，絕對無法勝出，因此一定是負三的結果，兩個人的團隊，也無法勝出，還要共同負擔負三的結果，三個人的聯盟，不但可以勝出，也可以獲得三個單位的報償，平均每人可獲得一單位，接著，四個人的團

[25] 請參 Riker (1962: 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隊，雖然也可以勝出，但是卻是由四個人分三個單位的報償，平均每人獲得 0.75 單位的報償，五個人的聯盟，因爲沒有付出報償的輸家，每個人都獲得零單位的報償。上述的推論來看，如果組成聯盟的當事人都是理性的，懂得報償極大化的原則，則他們就會組成「最小勝利聯盟」，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參與者離開，這個勝利的地位就崩解的聯盟，然而正因如此，每位參加聯盟者所獲得的平均報償將會是最大的。

這樣的理論，讓學者能夠清楚地將理論放在經驗世界當中來檢證，也就是說，Riker 藉此提出一種觀察經驗世界的法則，來觀察政治運作中聯盟組成的活動，藉此了解權力運作的內涵。學者 Laver 與 Schofield (1990: 70-71) 據此對最小勝利聯盟的理論，作了一個經驗的統計，他們依據十二個歐洲國家從一九四五至一九八七年間的 218 個成形政府的型態，[26] 統計如下：

表 1　歐洲十二國聯盟政府型態統計，1945～1987[27]

	總　數　目	全部情況（%）	多數黨不存在（%）
多數政黨存在			
單一政黨政府	14	6	
超越多數聯盟政府	8	4	
多數政黨不存在			
超越多數聯盟政府	46	21	24
最小勝利聯盟政府	77	36	39
少數聯盟政府	73	33	37
總　　數	218	100	100

圖表來源：Laver and Schofield (1990: 70).

從上述簡單的經驗資料可以看出，Riker 理論的預測「成功率」，不論包不包括多數政黨存在的情況，大約是四成左右，這樣的預測率不論是

[26] 這些國家包括：奧國、比利時、丹麥、芬蘭、德國（西）、冰島、愛爾蘭、義大利、盧森堡、荷蘭、挪威、與瑞典。

[27] Laver 與 Schofield 書中有其他部分討論最小勝利聯盟與其他預測理論（如政黨意識型態）的優劣，Riker 的最小勝利聯盟是一個「基礎理論」，假定只考慮 side payment 的狀態下的行爲預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好」還是「不好」，都有其一定方法論上的價值。[28] 在 Riker 心目中，一般化而非個案的方式來討論一個政治現象，起碼有兩個好處，一是在學界資源有限的前提之下，營造一個能夠集中火力投入的研究「焦點」（focal point），再來就是這些有系統推論出來的理論，讓我們尚未接觸經驗世界之前，已經先爲我們選擇了一個有意義的起點；當然，當理論與經驗世界之間的落差產生時（這是很正常的），就是新一波理論改進與下一波更深入理論發展的動力所在，這也是推動學界進步的路徑。當然，推論過程是否一定要如賽局理論或是形式模型的嚴謹，才能引導出一般化的理論？答案是否定的，在此有三個例子可以說明。

首先，Riker 在研究聯邦主義的學術次社群當中，也享有一定的名聲，在其早期聯邦主義的論著當中（Riker, 1964），他毫不掩飾對傳統聯邦主義研究個案取向的方法不以爲然，雖然他沒有提出如建構聯盟理論相同嚴謹的推論過程，但是仍對聯邦主義的起源與維繫，提出屬於 RCT 的看法。[29] 學者稱 Riker 的理論是「有時是錯的，但是比其他人都更正確」的狀況，[30] 由此可知，RCT 的概念，也可以藉由非模型、簡單的推論邏輯，被發現出來，事實上，Riker 認爲許多傳統的政治學論述中，也早就有 RCT 的元素在其中。[31]

再者，即便不由自己發展理論，Riker 也能夠從別人的著作當中，尋找政治科學發展的焦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藉由法國政治學家 Maurice Duverger (1963) 以經驗累積所陳述的一個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關係的法則，[32] 來表達從 Popper (1963)、Kuhn (1970) 及 Hempel (1966) 眼中，能夠

---

[28] 這就是爲什麼 Green 與 Shapiro (1994) 批評 RCT 理論大部分無法通過經驗檢測，並沒有給 RCT 帶來重大的危機，因爲當 RCT 對某一個政治學議題提出屬於 RCT 的看法時，這看法不論經驗上的對錯，必定是想完整回顧該議題學者無法不注意的論述，這也可能是學界本來就是傾向「追新」的本質所致，願意聆聽新看法的集體心態所造成。

[29] Riker (1987: 13) 認爲，聯邦體制可以成形，最重要有兩種可能性，一是滿足某些政治人物或團體準備對外擴張的動機，或是當政治人物之共同面對到外交或是軍事的外在威脅時，較有可能形成聯邦體制。

[30] 請參 Riker (1955, 1964, 1975, 1987)，另一篇評論文章 McKay (2001)。

[31] 請參 Riker (1990)。

[32] 就是學界所熟悉的 Duverger's Law，請參 Riker (1976, 1982)，該法依照原文作者的說法如下：「單一選區一票制偏向形成兩黨體制……在本書所有的假設當中，這項論述最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累積知識的社會科學研究典範，這種方式的核心，就是以理論或是經驗累積的一般化法則，不斷接受經驗世界的考驗與修正的進步過程。

最後，面對「人爲何投票」這個讓 RCT 頭痛的問題（Blais, 2000；陳敦源，2000a），Riker 與其學生 Peter Ordeshook (1968) 提出理性投票者出門投票的原因之一，是因爲他們具有考量社區利益的能力，也就是所謂的「公民責任」（citizen duty）成爲個人選擇出門投票的重要動機之一，這種幾乎已經跨出 RCT 範疇的論述，並不是基於什麼樣的形式理論推論的結果，而是一種爲 RCT 辯護的「直覺論述」（intuitive argument），這種參與論述的方式，也成爲 RCT 理論面對挑戰時，最常使用的論述方式。

除了在方法論上的創見與身體力行之外，Riker 教授在研究政治的「實質」（substance）問題上，也有重要的貢獻，主要可以分爲民主制度以及操控遊說兩方面，前者從民主理論與制度理論的角度，引進「社會選擇理論」（social choice theory），對民主制度運作的程序正當性，提出質疑，這種質疑已經成爲研究民主理論者不得不去面對的問題，而這樣的質疑也突顯了「建立制度」過程的核心，可能是一場「渾沌」的競逐而已。而後者則是在這樣的民主程序不確定的前提之下，政治上的「失敗者」是如何經由適當的策略，能夠成爲民主程序中的勝利者，也就是從策略互動的角度，來了解實際政治的面貌。讓我們一一來檢視之。

二、民主制度

Riker 在民主理論上的貢獻，主要是以發掘社會選擇理論的政治學意義，並將之應用到政治學民主理論的範疇當中。這個引介不但改變當代政治哲學家對於民主政治的理解，也直接影響到 Riker 對於民主制度的選擇問題，提出制度選擇重要的「遺傳問題」（problem of inheritability）。這樣的引介除了開啓政治學界「理性選擇新制度論」（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研究的先河，[33] 也開啓了政治學界規範論述之外，檢視實務政治運作的窗口。不論是從制度理論或是操控遊說的概念來理解實際政

近一個眞實的社會現象法則」（Duverger, 1963: 217）。

[33] 相關論述請參陳敦源（2000b, 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治，都是 Riker 教授晚期教學與研究的重心。

當代的社會選擇理論，主要是經由數理邏輯的方法，對集體選擇程序進行邏輯上的檢驗，檢驗社會選擇的決策程序，是否滿足特定規範性，如公平等條件，其中最著名的發現，就是一九七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Kenneth Arrow (1963) 的「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簡單來說，如果社會選擇就是設計一種社會選擇函數，[34] 讓個人的偏好（價值）能夠組合（amalgamation）成爲集體的偏好（價值），同時要求「集體選擇理性」以及「程序正義」的決策程序，是不可能存在的。[35]

集體選擇理性的不存在，可以從著名的「投票矛盾」（paradox of voting）得到印證，這問題早在一七八五年就被法國數學家 Condorcet 發現。簡單來說，投票矛盾意指多數決原則的「循環」（cycling）現象，造成民主理論中所謂「個人理性下的集體不理性」（Rational Man and Irrational Society）（Barry and Hardin, 1982）現象。舉例來說，社會對於 X、Y、Z 三項公共財的偏好，是由 a、b、c 三位公民以多數決原則所決定的，假設個人的偏好如下：

---

[34] 社會選擇函數（social choice function）或是社會福利函數（social welfare function）是經濟學家相對於個人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概念，個人對於財貨的選擇，也可以類比爲社會對於財貨的選擇，傳統經濟學者對於理性前提（rationality postulate）對個人選擇的結果保持高度興趣，但是轉化成爲社會選擇函數的研究，Arrow 成功地將我們對於社會選擇制度的規範性要求，轉化成爲四種前提，包括「巴瑞多前提」（Pareto postulate）、「非獨裁前提」（Non-dictatorship）、「無限範疇前提」（unrestricted domain）、以及「不相關選項獨立前提」（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再加上一個程序理性的前提，就是所謂「遞移性」（transitivity），也就是說，要求社會選擇函數具有遞移性，就是不讓投票循環（voting cycle）的狀況發生。在這些前提之下，經過證明之後，Arrow 提出，所有可能的社會選擇函數，都至少會違反上述五項要求當中的一項，其中，如果我們要求程序理性反某一項我們對於集體選擇程序的規範性要求，比方說，如果我們希望集體選擇的結果具有遞移性，有一種方式就選擇以獨裁者的意志爲全民意志的社會選擇方式，也就是違反非獨裁者前提，因爲獨裁者自己的偏好絕對會有遞移性的。相關詮釋請參 Riker (1982: 115-136), Mueller (2003: 563-596)。

[35] Arrow 的理論在經濟學門內很早就受到不少批評，比方說，諾貝爾獎經濟學者 James Buchanan (1954) 就認爲，我們不應該預期集體選擇應該展現個人選擇的理性，所以 Arrow 的問題只是一個假問題（pseudo-problem），另一位經濟學者 G. Tullock (1967) 也認爲，Arrow 所提出的問題，是統計上並不常發生的案例；但是，這些論述都沒有辦法改變，因爲 Arrow 的起頭，經濟學門產生了一個名爲「社會選擇理論」的學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 X > Y > Z$$
$$b = Z > X > Y$$
$$c = Y > Z > X$$

上列文中「＞」的符號代表「強偏好」（strict preference）。個人的偏好結構與捉對選擇（binary choice）的情況之下，社會的偏好會產生 X＞Y＞Z＞X 的循環現象，[36] 也被稱爲社會選擇「非遞移性」（intransitivity）的現象，深深改變 Riker 對民主政治的基本看法。經過了民主多數決「不可能定理」的洗禮之後，民主決策的「隨意性」（arbitrariness）與「不穩定性」（instability）成爲 Riker 建構屬於自己民主理論的核心論述。首先，民主決策隨意性的認知，讓 Riker (1982: 239) 質疑以「民粹主義」（populism）爲導向的民主政治運作的正當性，他說：

> 民粹主義能否作爲道德上具有強制力的論述，取決於是否存在一個由投票所產生的全民意志，如果投票無法展現這樣的意志，這種道德上的強制力就馬上消失了，因爲全民意志並不存在，如果人民意志表達得模糊不清，他們無法設立法律讓自己得自由。民粹主義的失敗並不在於它道德上錯誤，而是它根本是一個空殼子。[37]

---

[36] 更完整關於投票矛盾的論述，請參陳敦源（1998）。

[37] 一位匿名審稿人提出除了 Riker 以外，是否有其他對於民粹主義提出的批判，本文無法在此立刻進入政治哲學的領域，討論 Riker 理論的相對位置，但是可以提出一個臆測的看法。我們認爲，民粹主義在民主理論中的問題，長久以來就是眾所皆知的，只是一直沒有一個簡單、有系統的理論針對民粹主義的問題提出看法。Riker 的貢獻可能就在此，他只是提出了一個民主理論中的「民俗理論」（folk theorem），清楚論述大家流傳已久的一種對民粹主義的民俗看法。歷史學者與評論家 John Lukacs (2004) 曾經這樣說：「是的，民主是多數統治，但是，自由主義在此必須要進入。多數統治必須受到少數權益與個人權益保障的制約，當這種制約微弱、未被執行或是不受民眾歡迎的時候，民主政治就成單純的民粹主義，更重要的，這可能會成爲一種國家民粹主義，民主政治未來發展最大的隱憂，就是自由民主政體退化成爲民粹主義政體。」可以代表自由主義論者心中對於民粹主義掏空自由民主的憂心，這個憂心都可從 Riker 的論述中找到堅實的理論支持；另外，如果結合 Riker 對民粹主義的批判與後來 RCT 提出的混沌理論，我們也知道民粹主義與集權的法西斯主義只有一線之隔了，是一種在民主外衣下的極權主義。美國

華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於不同的選舉制度所選擇的勝利者可以不同，也就是沒有任何一個勝者是在所有制度之下都可以得勝的勝者，[38] 民粹主義的正當性就會瓦解。事實上，Riker 這樣的論述，是對自己過去對美國民主政體幼稚觀點的悔改。早在 Riker 發展全新的政治學理論之前，他也是一位傳統的政治學者，我們可以從他於一九五三年出版的一本美國政府的教科書可以看出，他對於民主政治的認識，與當時以（放入 Riker 對當代的批評詞）個案展現的方法，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對於民主政治的認同與迷惑，卻是一以貫之的，他曾說（Riker, 1953: 35）：

> 本書所關心的是一個急迫的問題：民主的理念何以是可能的？民主的方法爲何是可行的？……既然民主人士認爲民主可以帶來人民生活的提昇，我們應該問「這是如何得到的？」這樣的問題，然而，在本書有限的空間之下，我願意接受民主在哲學上的價值，如此才能讓我們來思考所謂的「民主問題」，而民主問題就是：民主試圖達到一件不可能的任務，這就是它值得追求以及運作失敗的關鍵，民主試圖將歷史當中由少數統治多數人的獨裁形式，轉變成一種民眾自治的統治方式……。

Riker 在該書中，以美國憲政體制爲例，討論美國是如何藉由這套制度將人民統治從口號變爲可能，也就是說，美國憲政體制的價值，在於能夠操作化民粹主義。很顯然地，Riker 接觸到社會選擇理論之後，在集體選擇隨意性的「真理」面前，全然的悔改，之後，Riker 對於美國憲政體制的設計，也有了全新的看法。[39] 他認爲，美國分權體制的重要性，在於壓抑民主決策過快獲得，以避免落入特定利益少數的操控，或是多數暴力的局面，這也是自由主義的精隨所在，而民主制度設計，嚴格來說並不是「人民統

第十七任總統 Andrew Jackson (1808-1875) 就曾經說：「極權與專制可以在多數的狀態下被執行，它會比一人集權與專制更激進、更強烈、更不留情。（Tyranny and despotism can be exercised by many, more rigorously, more vigorously, and more severely, than by one.）」。

[38] 這種超越制度的勝者通常被稱爲「康多色贏家」（Condorcet winner）。

[39] 對 Riker 民主理論轉變的描述，請參 Terchek (1984: 52-60)。另外，從 Riker (1992c, 1992d) 支持兩院制的論點，也可看出他受到民主決策隨意性的影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治」（popular rule），而是一種「定時地、隨機地行使人民否決權（popular veto）」，有權者才會產生回應人民需求的動機，「去腐但未必興利」是民主政治最底線的運作模式，也是目前唯一真正被實施的民主政治（Riker, 1982: 244-246）。

再者，Riker 對於民主決策的不穩定性，也有一定的認知。不穩定性與隨意性是兩個相通的概念，既然民主多數決的結果是隨意的，從空間理論（spatial model）的角度來看，政策空間上任何一點都可能成爲多數決的產出，這就是 Riker 學生 Richard McKelvey (1976) 證明多數決結果只存在於完全不穩定的狀態之中的「渾沌定理」（chaos theorem）；依照 McKelvey 的結論，如果任何議程都可能（也就是議程主導權未定的前提），政策空間（policy space）上的任何一點都可以成爲多數決的產出；換句話說，多數決是「先天不穩定」（inherently unstable）。[40] McKelvey 近於煽動性的建議，很快就引來 Gordon Tullock (1981) 的挑戰，他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現實世界中，爲何有許多的穩定？」（Why so much stability?），以表達他對於理論與實際政治之間的重大差異的好奇，他的言下之意是：「政治世界若是照 McKelvey 的理論運作，應該是一團混亂才是，哪會有今日政府運作、政策通過的安定狀態呢？」[41]

差不多同一時期，Riker 的另一位學生 Kenneth A. Shepsle (1979) 的「結構誘導的穩定」（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um）理論已近成熟。Shepsle (1986: 52) 認爲，過去理性選擇學派對於多數決均衡的研究，都是所謂「偏好誘導的均衡」（preference-induced equilibrium）的研究，試圖從固定偏好結構當中，尋找集體選擇的穩定結果；但是，這種以偏好爲主的理論推演有其重大瑕疵，因爲制度的結構也應該是均衡概念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42] 因

---

[40] 政治學者這才明白，多數決的道德面紗之下，原來是赤裸裸的議程主導權（agenda-setting power）爭奪戰，在參與者策略行爲的掩護之下，較力爭勝。「渾沌定理」出爐之後，多數決當中的「什麼事都可能發生」（anything can happen）成了民主理論家揮不去的夢魘，這結果也使學者對民主決策的道德期許，產生了疑慮。

[41] 感謝一位匿名評論人的提醒，McKelvey 混沌理論只適用在超過單維的政策空間，單維的分析中，A. Downs 的中位數選民定理，被認爲有「趨中」的穩定作用。

[42] 有趣的是，Shepsle 的理論並未改變經濟學理論中「偏好固定」傳統，他所謂的結構是決策程序上的限制機制，而非如 Wildavsky (1987) 的研究將文化當成個人偏好形成過程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非均衡的結果並不表示現實世界就是永無寧日的混亂，而是忽略了「制度有關」（institution matters）這個結構的因素。他以美國國會爲例，解釋在政策空間先天不穩定的前提下，國會的委員會制度如何發揮關鍵作用，使公共政策找到穩定的多數決均衡產出。Shepsle 的理論一提出，就被視爲在渾沌理論與實際政治之間搭起了重要的橋樑，並將「制度有關」的概念炒熱了起來。然而，事情還未結束，Shepsle 的理論，的確幫助 RCT 走出「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的困境，但是在 Riker (1980) 提出了「遺傳問題」之後，才真正開啓了理性選擇學派研究制度的大門。

Riker 的問題非常簡單，他認爲：制度只是「偏好的聚合」（the congealing of tastes），如果要將其視爲均衡的重要元素，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制度也是人們所共同選擇出來的（choose how to choose），因爲人能夠因著政策偏好而策略性地選擇政策抉擇的制度，制度選擇的本身應該會「遺傳」（inherit）到政策選擇空間中的不穩定性；因此，單談「制度有關」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將制度起源的問題也一併列入均衡概念的考量當中，不能分割。

Shepsle (1986) 的回應有下列主要的兩點，第一點是歷史論，Shepsle 認爲，任何一次的制度變革，都不是在真空的狀態下進行，換句話說，由歷史所殘存的結構因素，會對於變革的制度選擇內容，產生篩選的穩定作用；[43] 第二點是資訊的不足，由於人們對客觀環境資訊的瞭解無法完整，這種不完整幫助「短路」（short-circuited）了政策選擇領域與制度選擇領域之間的「遺傳」作用，阻隔了不穩定基因的傳遞，這也使得制度選擇領域具有獨立的性格，不再是政策領域的附庸而已。這兩個回應都是試圖尋找政策選擇領域與制度選擇領域之間的「分隔物」（wedge），以杜絕不穩定的「遺傳」作用。總括而言，以上這些理論就是理性選擇制度論的核心（Krehbiel, 1991: 31-34）。

最後，Riker 對於民主制度可操控性的理解，讓他找到觀察民主政治現象的實務面向，政治人物策略性地運用各種可能的力量集結支持，以至於

的限制機制。

[43] 事實上，Riker (1995: 121) 本人也贊同這個觀點，他說：「沒有一個制度是從新創造的，…任何新制度中都可以看見過去的殘餘。」（…no institution is created de novo… in any new institution one should expect to see hangovers from the pas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以從在野變爲在朝的過程，成爲 Riker 生前最後的研究重心。

三、操控遊說

Riker 最後十餘年的研究重心，是環繞在自己發明的一個英文字—Heresthetics。這個字源自於一個希臘文，代表「決定」與「選擇」的意義，其中包括行爲者對所處環境遊戲規則的熟悉，或是對於遊戲規則本身的選擇與操控，以至於能夠在政治競爭場域勝出的意義；Riker 認爲，這些希臘哲人發明的字根，在現代賽局理論與社會選擇理論的關照之下，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因此他用這個字來代表政治策略的研究（Riker, 1983: 55）。在一本蒐集了十二個操控遊說的故事的著作前言當中，Riker 如此說（1986: ix）：

> 「操控遊說」是一個由我創造出來，用以表達政治策略的字，它源自於希臘文中「決定」與「選擇」的意思，這個字包含了言詞遊說（rhetoric），也就是說服藝術的意義，但是，它的內容又比華麗的辭藻來得豐富多了。政治人物在競爭場中獲勝，通常是他能夠讓更多的人願意與他建立聯盟關係，但是，這些勝利者所作的，大大超越單純的言詞說服；他們通常能夠建構一個環境，讓其他的人自己願意、或是出於無奈地加入他的聯盟，有時甚至不需要言詞的說服，「操控遊說」的意義就是：建構一個你可以贏的世界。
>
> 「操控遊說」是一種藝術，不是科學，沒有一組科學的法則，可以讓當事人機械性地發展出成功的策略，反之，一個操控遊說的新手，必須從實務操作當中，去獲得能讓自己勝出的策略，……。

對於這樣「實務」的一個題目，Riker 的興趣來自於前面一節當中，他從社會選擇理論所得來，關於民主決策隨意性以及多數決不穩定的認知。在這樣一個民意表達不精確的民主社會當中，制度雖然能夠發揮某些穩定功能，但是「操控遊說」者仍然能夠憑著自己的經驗與策略技巧（savvy），在爭競場域勝出；在 Riker 晚年的認識當中，政治的本質就是「政治輸家」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political losers）尋找操控遊說的施力點，而成爲贏家的過程（Shepsle, 2003）。本文接下來先以一個空間理論的例子，來說明政治操作的可能性，這樣的可能性，並不是 Riker 憑空想像或是自己親身的參政經驗，而是從他及他的學生所發展出來，對民主制度理解的形式理論當中所得的結果；基於這樣的認識，Riker 在晚年所提出兩個重要的論述，可以視爲對操控遊說概念更深入的引申，一個是他對於美國「南北戰爭前政治歷史」（antebellum politics）的詮釋，也就是對林肯總統與黑奴議題的重新詮釋；再就是他逝世前還在修改的著作（Riker, 1996），是關於美國憲法批准過程論辯的研究。

圖 1 上方，我們先看一個單一議題的空間模型，假設有一個議題空間 D_1，有三位人民對該議題具有固定的偏好，他們對 D_1 政策的「理想點」（ideal point）分別是 A_1, B_1, C_1，而 SQ_1 代表政策的現狀點（status quo）。今天再假設這個社會如果要改變現狀，必須要經過多數決的同意，因此，如果有人具有提案權，要求這三位人民對提案與現狀之間作一個選擇，則落在 $W(SQ_1)$ 區域中的提案，是能夠通過多數決考驗的提案。在一個議題空間之下，多數決的結果，對人民 C 是最不利的，因爲他偏好 SQ_1 勝過 $W(SQ_1)$ 的任何一點，換句話說，他是 D_1 空間中的「輸家」。[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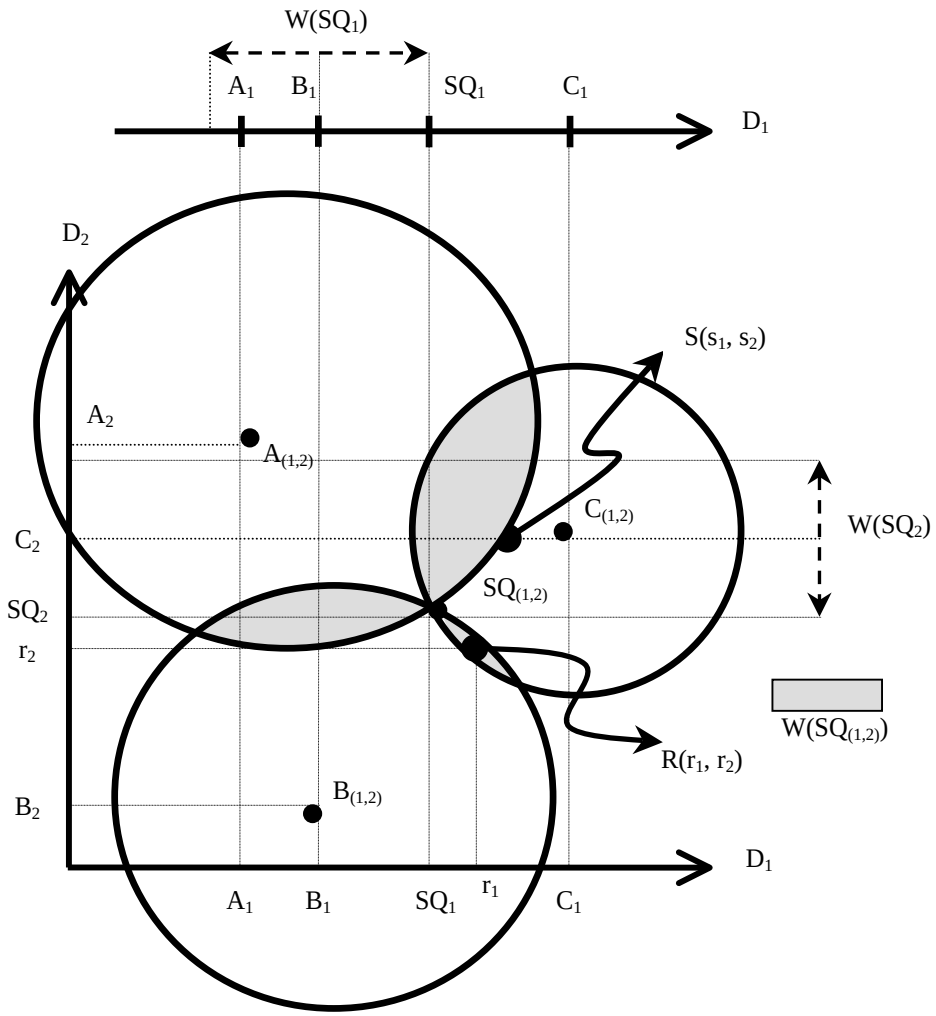
假設 C 是一個操控遊說者，他面對 A 與 B 在改變現狀上的聯盟壓力，能有什麼因應的方法？假設人民 C 能夠找到一個議題 D_2，這個議題上三位人民的固定偏好如圖一下方雙議題的政策空間的 Y 軸所示，他只要能成功地將第二個議題與第一個議題「綁」在一起，就能夠創造非常利於自己的環境。[45] 圖 1 中的三個圓圈，分別是在兩度政策空間當中，三位市民以自己的理想點與 $SQ_{(1,2)}$ 爲半徑所畫出來的，圓圈上的任何一點，代表該市民相同的偏好，也可以說是兩度空間中的「無異曲線」（indifference curve），

[44] $W(SQ_1)$ 的求取，是以 B_1 爲中心，往右和往左延伸 $\|B_1 - SQ_1\|$ 的線段；而 $W(SQ_2)$ 則以 C_2 爲中心，可用同樣方法推得。

[45] 對於創造新議題空間或是「政策空間維度操控」（dimensionality）在政治過程中的意義，學者 Scott C. Paine (1989) 有深入的論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　「操控遊說者」運作的空間模型



圖表來源：作者自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三個圓圈相交處所得出來的三個橄欖形的區域（有陰影處理的部分），就是現狀 $SQ_{(1,2)}$ 的勝利集合 $W(SQ_{(1,2)})$，也就是說，在這些勝利集合當中的任何一點，都能夠以多數決的方式，打敗兩度空間的現狀 $SQ_{(1,2)}$，比方說，政策點 $R(r_1,r_2)$ 如果被提出與 $SQ_{(1,2)}$ 進行「捉對多數決投票」（binary voting），人民 B 與 C 將會以多數通過 $R(r_1,r_2)$，因爲兩人對 $R(r_1,r_2)$ 的偏好都勝過對 $SQ_{(1,2)}$ 的偏好。

值得注意的是，$R(r_1,r_2)$ 這一點，如果分開在兩個議題空間中分別投票，不論是 r_1 還是 r_2 都不可能在多數決當中通過，因爲他們並沒有落在 $W(SQ_1)$ 或是 $W(SQ_2)$ 的區域當中。當然，如果能夠以 $S(s_1,s_2)$ 取代現狀，人民 C 將會獲利更大，因爲與 $R(r_1,r_2)$ 比較起來，在 D_1 上 S 比 R 更接近 C 的理想點，而在 D_2 上，S 根本是落在 C 的理想點上。這個例子所要表明的，就是如果 C 擁有某種設定議程的能力，不論是站在制度議程設定點上，或是媒體的議程設定點上，他就會擁有若大的權力獲得自己所想要的結果，即使在單一議題的空間中，他是一個徹底的輸家。

這個論述剛好與 Shepsle 在前一節當中「結構誘導的穩定」的概念相反，「結構誘導的穩定」告訴我們在不穩定的多數決環境當中，如果要求得穩定的多數決結果，必須將議題切割開來討論，就像是國會當中的委員會分工一般，民主決策才得以穩定，這也是民主制度的核心內涵；然而，從操控遊說的角度，論點就是反過來操作的，要爭取勝利的方式則是尋找可以破壞現狀聯盟的議題，讓自己站在有利的位置上建構勝利聯盟，最好是將新的議題與老議題綁在一起，製造議題空間上的不穩定，以利於自己從中求勝。

從實際案例的角度來看，Riker 以美國南北戰爭前的國內政治，來說明操控遊說在政治操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認爲，美國國內政治戰前最重要的政治聯盟（1800～1860），就是南北各州因爲農業發展而組成的「農業擴張者」（agrarian expansionists），這個聯盟當中有北方工業較爲發達的州與南方農業較爲發達的州所組成。另一個輸家的團體，是所謂「商業團體者」（commercialists），一直希望能夠降低關稅，刺激商業發展，這與農業擴張者的當權聯盟的主流意見是不同的，因爲農業發展需要關稅的保護，這些商業團體最後找到了一個議題，就是解放黑奴，在一八六〇年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功地將當權聯盟給拆解了，讓林肯選上總統，但是，此舉也開啓了美國的南北戰爭（Riker, 1982: 200）。這個論點對一般接受規範性詮釋歷史的人來說，是難以下嚥的，因爲林肯解放黑奴是作一件「對」的事，而不是「自利」的事，但在 Riker 的詮釋之下，美國偉大的解放黑奴運動，事實上是輸家運用「議題操控」（dimensional manipulation）的技巧，讓自己成爲制度上贏家的一個案例，學者從不同的角度試圖拆解 Riker 的論述（Mackie, 2001, 2003; Weingast, 1998），但是都無法否定 Riker 論點的說服力與原創力。

在研究操控遊說的路程上，Riker 最後將注意力放在「美國憲法批准的過程」（ratification process），從論述策略的角度，有系統地了解操控遊說者的實際作爲。他發現，在美國憲法批准過程中的「論戰」（campaigns），正反雙方的論述策略，大概可以歸納爲兩個部分（Riker, 1996），一是雙方都樂於使用負面宣導，也就是指出對手的危險性，或是不支持自己的負面後果，較少以正面的方式討論議題，第二就是，當一方找到一個足以說服人的負面說法，就會一直使用下去，而處在被攻擊的一方，就會避開或是忽略這樣的攻擊，第二個部分的論述，Riker 應用形式理論的概念，推論出雙方在負面論戰中的對戰原則，Riker (1996: 6) 說：

> 當論戰其中一方明顯在某項論點上站了上風，另一方就會放棄這個論點（優勢原則；the Dominance Principle），當雙方都沒有明顯在某項論點站了上風，雙方都會放棄這論點（分散原則；the Dispersion Principle）。

這種負面論戰的本質，也是許多選戰當中的真實寫照，這樣的提法當然也提供了包括傳播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界，觀察決定許多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中，政治人物溝通模式與政治結果之間關係的一個機會。事實上，如果 Riker 還能多活十年，他已經準備好與目前流行的「商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Elster, 1998；黃東益，2003）的民主理論潮流，展開建設性的對話，甚或是與傳播學界中最重要的議題設定效果的相關研究（agenda-setting effect）（McCombs and Shaw, 1972；Protess and McCombs, 1991；陳敦源、韓智先，2000），展開有意義的對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Riker 理論評述與可能的本土應用

從前述的整理可以看出，Riker 領導下 RCT 在政治學的發展，有三方法論上的相關議題，值得討論。

一、Riker 理論評述

第一，理性選擇方面：包括 Riker 在內，RCT 學者對於理性選擇的基本假定問題的論戰，興趣並不大。這種涉及認識論層次的哲學思辯，在 RCT 學者的眼中，是沒有答案的，RCT 學者將這一點當作推論的基本假定，是將之當作「科學研究學門」（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Lakatos, 1978）的「核心」（hard core）部分，除非它已有完整並更優良的取代核心，[46] 不然即便是不完全，也是會繼續在其上進行研究的。因此，RCT 在學術策略上，對核心問題採取不理睬的態度，但是，對於個領域當中的主要論述，卻採取積極提供「另類」解釋的做法，我們可以從 Riker 的身上明顯看到這個模式；事實上，這是深知學界「追新」本質的一種發展策略。比方說，在聯盟理論以及聯邦主義論述中，Riker 選擇 RCT 爲建構「另類」解釋，對當時的主流論述產生衝擊，如果細讀這兩個理論發展的論述過程，Riker 都是先將傳統的理論作方法論上尖銳的批評，再應用自己所屬 RCT 的論述方式，提出完整且新穎的看法，而且這些看法都滿足「可證爲否」（falsifiable）的科學論述，提供學界比較與繼續討論的基礎，這種模式後來也成爲 RCT「入侵」政治學許多次領域的主要手法，而這種在某些領域上選擇規避，但在另外一些「接觸競爭」（engaged competition）的做法，成爲 RCT 發展的主要策略，可能也是 RCT 得以在美國政治學界成功的原

[46] 值得一提的，台灣大學的石之瑜教授（1999）所著的一篇有趣的論文，針對 Riker 理性選擇理論的錯誤所提出的一個非理性的模型，但是嚴格讀起來，石教授的文章並沒有離開 RCT 討論個人選擇的框架—效用理論（utility theory），也就是說，石教授只是在 RCT 的分析框架之下，加入他認爲應該加入的決策元素，這一點與在 Riker 與 Ordeshook (1968) 針對「人爲何投票」的議題，提出在效用理論結構之下，加入「公民責任」的意義是相同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不知 Riker 前述對於公共事務論戰本質的理論靈感，是否來自於 RCT 的發展策略成功的推想。

第二，制度研究方面：制度研究是政治學的核心內容之一，尤其是在正式制度的研究方面，包括憲法、選舉制度或國會制度等，都是政治學界的研究重心。RCT 在這方面的貢獻，可以說是十分重要的，最主要是對傳統政治學制度研究，加入兩個元素。首先，在制度設計方面，Riker 從 RCT 的角度，對美國憲政體制的設計精神，作了一個「懺悔」式的反省，也藉由 Arrow 的理論，將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分別了出來，在「不可能定理」的光照之下，民主政治成爲一種「排誤」的制度設計，而不是展現全民意志的設計，因爲「排誤」是一個消極的概念，當然會有論者對於這種非黑即白的選擇結構也不以爲然（Coleman and Ferejohn, 1986），[47] 但是，Riker 的論述讓學界認知到民主制度設計，不能獨尊民粹主義的規範性意含，已經是民主理論不可或缺的一個論點；再者，對民主制度選擇方面，RCT 爲傳統正式制度研究，加入理性行動者之間策略行動的因素，不但可以分析制度能否依照設計的意念展現效果，也能用來分析制度選擇時刻的計算基礎與通過的可能性，這個複雜的過程，都可以從 Riker 與其他同僚們之間，關於「遺傳問題」的辯論中捕捉得到，可以說是政治學界研究制度不可或缺的理論基礎，唯一值得憂慮的問題，就是策略行動不是一個容易作經驗研究的概念，[48] 結果就是，RCT 可以經過前端形式理論的推演，提供許多新穎的論點，但是，這些論點卻難達成 Riker 理想中政治科學研究後半段經驗檢證的動作[49]。

---

[47] 對於 Riker 理論的其他批評，請參 Radcliff (1993), Weale (1984), Radscliff and Wingenbach (2000)，其中 Riker (1993) 也有親自回應 Radcliff 於 1993 年的批評。

[48] 比方說，要指認發生了策略投票（或是棄保效應），事實上必須要從了解參與者眞實的偏好排列開始，對於社會科學研究對象—人，具有策略回映的本質，任何測量的信度都會是問題。Mackie (2001) 質疑 Riker 解釋內戰前政治的主要論點，就是質疑 Riker 對於主要參與者在民眾心中偏好順序的問題，如果有不同的排列，解釋也會不同，如果這些不同的偏好排列得到某種證據的支持，Riker 對於戰前政治的詮釋，就會破功。

[49] 事實上，Lichbach (2003) 關於 RCT 的論著，一開頭就提到政治學界充斥沒有經過驗證的假設，與沒有足夠理論背景的統計檢證，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 RCT 學者只注重理論推演、忽視經驗研究所造成的。

國家圖書館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三，操控遊說方面：Riker 晚年對於政治環境當中的溝通議題產生興趣，是有脈絡可循的，也就是說，Riker 自己晚期的作品是他早期作品累積的結果，這個累積可以從兩方面看見。其一，在聯盟理論一書中，Riker 將「勝利」（winning）視爲政治人物最核心的價值（Riker, 1962），他認爲，討論政治的核心，就是「政治人物依附於可變動遊戲規則之下的輸贏」，因此，政治學者必須要對這核心提出看法。其二，從社會選擇理論對制度規範輸贏不穩定的論述，Riker 對於輸贏因素的搜尋，從聯盟、議程設定、議題操控，轉變到人類最原始的策略互動工具—語言修辭，脈絡是很清晰的，當然，在方法論上，Riker 雖然稱這樣的議題是一種「藝術」（Riker, 1986），沒有科學法則可循；但是，他在最後一本著作當中（Riker, 1996），仍然是以演繹邏輯的方式，從美國憲法批准過程的經驗資料，尋找可以陳述的通則。Riker 以科學研究的精神討論操控遊說這樣一個詮釋學派（interpretists）最擅長的議題，可以說是一種「融合的努力」（synthesizing）（Lichback, 2003），這種努力有助於本文一開頭所描繪美國政治學會路線爭議的緩和，當然，這樣的應用，也讓形式理論的邏輯，能被用於以往較不擅長的溝通領域，隨著賽局理論在「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之下，所發展出來的許多隱含溝通的模型（比方說，訊號局, signaling game），可能是 Riker 操控遊說理論研究下一步重要的發展；根據 Iain McLean (2002) 對 Riker 在操控遊說理論發展的討論，認爲 Riker 的論述風格，可以被視爲一種「分析敘事」（analytical narrative）（Bates and others, 1998）的方法，這是一種結合賽局理論分析精神與歷史學家敘事內涵的方法，這種方法目前也正被應用於包括結合歷史與理性選擇制度論（Katznelson and Weingast, 2005）、結合賽局理論與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Heath, 2003）、以及結合法律與社會選擇理論的各種努力（Farber and Frickey, 1991；Epstien and Knight, 1997；Stearns, 2000）。[50]

[50] RCT 在這個部份的發展，也回答了一位匿名審查人對於本文是否有與其他相關領域對話的疑問。比方說，RCT 與歷史制度論的相互影響，造就了所謂「分析敘事」的分析方法，結合歷史敘事與賽局分析的一種有趣的論述形式，目前這個對話已經進入討論「偏好形成」（preference formation）與結構的關係，未來的持續討論值得期待；事實上，由於 RCT 的發展，許多傳統以結構或是規範式論述爲主的領域，都產生了對話的可能，後續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總括來說，Riker 一生的研究重點，從學門的發展來看，剛好符合學者 Mark I. Lichback (2003) 對理性選擇學派發展過程中，「競爭、忽略與融合」（competing, ignoring, and synthesizing）三種策略的描述，而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這三種策略所產生的結果，對學界目前發展各有其重要的方法論與研究內容的影響，我們可以從下表 2 的整理看見這個趨勢：

表 2　Riker 的學術生涯發展表

	發展策略	學　術　貢　獻	主 要 疑 義
理性選擇	競　爭	提供學界一個另類論述架構，滿足學界「追新」的慾望	規避理性本質討論
民主制度	忽　略	1. 充實自由主義制度性內涵 2. 建構政治學的制度理論	經驗研究的不足
操控遊說	融　合	建立與詮釋學派的溝通橋樑	尚未完成

圖表來源：作者自繪

二、RCT 理論的本土應用

最後，本文回顧並評述了 Riker 一生的 RCT 學術貢獻之後，也願意花一點篇幅，來簡單討論 RCT 的研究對台灣政治學研究可能有的貢獻所在。首先，在 RCT 的推廣與發展上，台灣學界首先應該分辨 RCT 與選舉研究的調查方法之間的差異，大概可以分爲上游的理論建構與下游的經驗驗證兩個部分，雖然調查研究的方法不一定需要 RCT 的理論建構，但是 RCT 的出現已經成爲選舉研究提供了一個種要的另類假設來源，事實上也大大增強了調查研究的理論性；然而，RCT 的理論建構訓練，比起統計調查方法的訓練，是更爲複雜且繁重的訓練過程，Riker 的成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

的相關論述，可以針對 RCT 在各領域的實質研究中，尋找與整理對話的內容，再做出評述，本文有限的篇幅，加上 RCT 所「入侵」的領域又多，無法一一顧及，然而，作者認爲，本文如果達到起頭的目的，已經足夠了。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能夠在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政治系依照 RCT 的需要建構一套不同於傳統政治學的訓練課程，用以訓練出一批 RCT 的「使徒」，在政治學門的不同領域攻城掠地、開花結果，但是，目前台灣的政治系所當中，並沒有出現這樣的可能性，雖然有零星的相關課程，但是都不足以完整訓練學生使用 RCT 的方法建構理論，因此在可見的未來，台灣政治學界 RCT 人才的訓練，可能仍要靠美國研究所的協助。

再者，在民主制度理論方面，台灣是一個後進的民主國家，民主政治的「文法」（syntax）與我國固有的威權傳統之間一直是同時存在的（Ordeshook, 1997: 3），需要學界從「真實」（realist）、而非道德至高點上來看待民主政治及其制度建構的議題，當然，由於外交上我國必須藉由民主政治與對岸政權作本質上的區隔，並藉以此獲取國際民主國家的支持，使得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反省與研究都是不足的。RCT 理論從 Arrow 以降到 Riker 在政治學領域的重新詮釋，對於民主政治從個體偏好到集體民意產生之間矛盾的本質，有深刻且務實的切入觀點，事實上是有助於台灣學界或是實務改革者，看清民主政治的運作本質，避免不切實際改革所帶來的傷害。比方說，根據學者陳敦源與李蕊蒂（2004）的研究，我國國會改革長久以來一直環繞兩個主題，一是立法效率，一是程序透明，但是由於立委選區利益與國家公共利益之間的矛盾（Shepsle, 1992），立委們有時面對爭議性很高的法案（比方說，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需要不公開的場合進行意見的整合，這也是第三屆國會末期在國會改革五法中將「黨團協商」法制化的重要背景，因此，由於個別選區與國家總體利益之間的矛盾本質，前述兩大改革目標之間，存在某種「蹺蹺板」的取捨關係。也就是說，當委員們的協商越公開，因爲選區利益的壓力，立法委員之間的妥協就比較難達成，立法效率就受到傷害；反之，要提升立法效率，就必須給予立法委員之間私下協商的空間，這種尋找制度變革原則的研究努力，就是 RCT 可以對台灣學界與實務界最大的貢獻所在。

最後，在操控遊說方面，我們提出李登輝前總統及其追隨者所提「本土化」的議題，應該也可視爲一種操控遊說應用的一個實例。[51] 當李前總

[51] 學者 Jack H. Nagel (1993) 應用 Riker 操控遊說的理論，討論紐西蘭在 1984～1993 之間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統上台時，我們可以視台灣爲一個穩定的後蔣經國時代，當時主政的當權聯盟是以國民黨外省精英爲領導、本省精英爲追隨者的集團，這個龐大的統治集團，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礎，但也有其內在矛盾，當時全國主要的議題面向，是繼承內戰時與共產黨鬥爭爲核心的「左—右」意識型態爲主的議題，但是，一個台灣籍總統進入這樣一個統治結構當中，他「贏」的策略會是什麼？如果依照 Riker 的操控議題的看法，李前總統的可能策略，就是一方面推動民主化，但另一手推動本土化。民主化是要將自己權力的來源，從國民黨統治機制中解放出來，讓少數沒有民意基礎但具有政治影響力的黨官，退出國家權力核心，而在政治修辭上，則是以「還政於民」作其主要內涵；另一方面，推動本土化則主要是利用一個新的議題面向，來取代原本「左—右」的議題面向，因爲，在強化本土意識的面向之後，原本以國民黨統治精英爲核心的政治聯盟會分解，而第一位台灣人總統在本土化的面向上，握有民主數人頭上的優勢，因此具有組成勝利聯盟最好的機會。當然，上述推論只是依照 Riker 思想模式的初步臆測，還必須另文論述。

五、結　語

本文以文獻探討的形式，對美國政治學門 RCT 發展的「掌門人」Riker 教授一生的學術思想，作一個完整的回顧，全文歸納如下。首先，本文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從了解 Riker 一生的研究內涵，對 RCT 更深入的理解，本文認爲台灣學界持續停留在「人是否是理性」、或是「量化 vs. 質化」、「本土化 vs.國際化」等面向上檢視 RCT，反而會失去接近 RCT 對當代政治學核心貢獻的機會，因爲，Riker 在理性選擇、民主制度、以及操控遊說等三個面向上，對政治學界產生重大影響。

第一，RCT 的應用，主要是 Riker 對傳統政治學的一種反動，他努力尋找第一代的 RCT 文獻之後，以「接觸競爭」（engaged competition）的方式，對政治學各領域進行入侵的動作，在學界「追新」的本性之下，RCT

由派領袖 Richard Seddon 的歷史，就是一個可以參考的研究案例，另一個案例則是研究英國政治的問題（McLean and Bustani, 1999）；其他應用在比較政治與公共政策分別請參 Cohen (1991) 與 Weimer (1992)。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期刊資料庫

在學界的影響力日漸擴大，最後成爲學界內被革命的對象。

第二，在民主理論與新制度理論的方面，Riker 引進並引申 Arrow 的不可能定理，不但讓他自己重新理解美國的分權體制，也讓 Riker 在民主理論當中，提出以自由主義抗拒民粹主義的看法，成爲一家之言；另外，他所提出制度選擇的「遺傳問題」，也成爲理性選擇制度論的關鍵理論，讓理性選擇制度論有不同於其他制度論的內涵，然而，這些理論的提出，常常忽略經驗驗證的工作，讓 Riker 心目中的科學發現，有只停留在前半理論推演的步驟。

第三，在 Riker 最後十餘年的研究重心，是環繞在自己發明的一個英文字—Heresthetics（操控遊說），用以代表政治策略的研究，他在民主決策隨意性與不穩定的認知之下，對精英的政治策略，也就是輸家如何變成贏家的策略研究，充滿興趣，他從議題操控的角度，重新詮釋美國內戰前的國內政治，認爲林肯總統及同派的人之所以會提出解放黑奴的政策，是一種引進新議題藉以分化現狀統治聯盟的「贏的策略」，而在他去世前仍在編寫的一本書中，藉由美國憲法批准過程正反雙方的論述，提出 RCT 觀察論戰的幾項重要原則，具有對詮釋學派與傳播學界進行融合的意義，也是賽局理論自資訊不對稱的發展之後，一個可以預期的應用領域，值得期待。

上述 Riker 的研究重點，從學門的發展來看，剛好符合學者 Mark I. Lichback (2003) 對理性選擇學派發展過程中，競爭、忽略與融合三種策略的描述，這三種策略所產生的結果，對學界目前發展各有其重要的響，一方面值得台灣學界重視，一方面也可看出這些論述背後的策略意圖，因此 RCT 在美國學界的霸權地位，不是沒有原因的。最後，從 Riker 新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台灣民主發展的研究，本文也提出可能的研究議程，不論是國會改革還是民主轉型的操控，都需要更多帶有 RCT 理論背景的研究來完成，讓台灣學界可以早日離開對於 RCT「進口的假對話」的階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石之瑜，1999，〈William Riker 的理性概念試評：非理性抉擇模式初探〉，《歐美季刊》，13(3): 229-260。

朱敬一，1998，〈解析學術本土化與國際化的爭議〉，中國時報，8/24，第 15 版。

林繼文，2001，〈創設、選擇與演化：制度形成的三個理論模式〉，《政治學報》，32: 61-94。

林繼文，2005，〈虛假霸權：台灣政治學研究中的理性選擇〉，論文發表於《且讓河水通井水：政治學方法論的檢討和拓寬》研討會，台北：文化大學政治學系。

吳秀光，1998，《政府談判之博奕理論分析》，台北：時英。

吳秀光，2000，〈理性抉擇途徑在官僚行爲研究上的應用〉，謝復生、盛杏湲（編）《政治學的範圍與方法》，台北：五南。

吳若予、蕭全政，2002，〈爲什麼不本土化？普同性社會科學觀的檢討〉，李文志、蕭全政（編），《社會科學在台灣》，台北：元照。

吳瓊恩，1999，〈公共管理研究途徑的反思與批判〉，《中國行政評論》，8(2): 1-20。

盛治仁，2002，〈政治學的理性，理性的政治學？談理性抉擇在政治學的運用〉，黃秀端（編），《政治學的發展：新議題與新挑戰》，台北：韋伯。

徐振國，2002，〈政治學方法論偏頗發展的檢討〉，《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 123-178。

袁頌西，1971，〈威廉 • 賴克爾（Willaim H. Riker）之政治聯合論述評〉，《食貨月刊》，1(9): 503-507。

孫同文，1998，〈台灣公共行政研究成果的回顧與評估〉，《暨大學報》，2(1): 133-1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許世雨，2001，〈公共選擇理論反思：『理性』與『自利』之迷思〉，《人事月刊》，191: 17-26。

黃世鑫，2002，〈真理或邪說？理論或教條？獨尊新古典經濟主義的禍患〉，李文志、蕭全政（主編），《社會科學在台灣》，台北：元照。

黃東益，2003，《民主商議與政策參與－審慎思辯民調的初探》，台北：韋伯。

陳敦源，1998，〈民意與公共管理〉，《公共管理》，黃榮護編。台北：商鼎。

陳敦源，2000a，〈人爲何投票？理性選擇觀點的緣起與發展〉，《民意研究季刊》，212: 31-64。

陳敦源，2000b，〈領導在憲政選擇過程中的穩定功能：從理性選擇制度論比較西班牙（1975～1978）與台灣（1988～1996）經驗〉，林繼文（編），《政治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

陳敦源，2001，〈新制度論的範圍與方法：一個理性選擇觀點的方法論檢視〉，《行政暨政策學報》，3: 129-184。

陳敦源，2002，《民主與官僚：新制度論的觀點》，台北：韋伯。

陳敦源、韓智先，2000，〈是誰告訴人民他們要什麼？媒體、民意與公共議程設定〉，《研考雙月刊》，24(1): 19-31。

陳敦源、李蒞蒂，2004，〈國會改革中的立法效率與透明課責—以黨團協商機制法制化實施前後爲例〉，「2004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關鍵年代與多元政治研討會」論文（12 月 18-19 日），高雄：義守大學。

謝復生，2000，〈理性抉擇理論的回顧與前瞻〉，《政治學報》，31: 141-153。

蕭全政，1998，〈學術研究本土化不是要關起門來作皇帝〉，中國時報，8 月 31 日，第 15 版。

蕭全政，2000，〈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意義與理論基礎〉，《政治科學論叢》，13: 1-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英文部分

Alt, J. E. and K. A. Shepsle, eds. 1990.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madae, S. M. and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1999. "The Rochester School: The Origins of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269-95.

APSA. 2000. "Planning Our Future: The Report of the APSA's Strategic Planning Commite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3(4): 887-893.

Arrow, K. 1963.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2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usten-Smith, D. and J. S. Banks. 1999.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I: Collective Preference*. A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Austen-Smith, D. and J. S. Banks. 2005.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II: Strategy and Structure*. A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Bates, Banks, J. S. and E. A. Hanushek, eds. 1995.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Old Topics, New Direc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nzhaf, J.F. 1965. "Weighted Voting Doesn't Work: A Mathematical Analysis." *Rutgers Law Review* 19: 317-41.

Barry, B. and R. Hardin, eds. 1982. *Rational Man and Irrational Society*.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

Bats, R. H., A. Greif, M. Levi, J-L Rosenthal and B. Weingast. 1998.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 NJ: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

Black, D. 1948. "On the Rationale of Group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6: 23-34.

Blais, A. 2000. *To Voter of Not to Vote: The Merits and Limit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Buchanan, J. M. 1954. "Social Choi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2(2): 114-123.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nd Kenneth A. Shepsle. 1993. "Biographical Memories: William Harrison Riker, September 22, 1920-June 26, 1993." http://www.nap.edu/html/biomems/wriker.html (accessed 2003/5/10).

Cohen, Y. 1991. "The Herestheticsof Coup Mak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4: 244-364.

Cohn, J. 1999. "Irrational Exuberance: When Did Political Science Forget about Politics." *New Republic*, Oct. 25.

Coleman, J. and J. Ferejohn. 1986. "Democracy and Social Choice." *Ethics* 97: 6-25.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Dryzek, J. S. 1992. "How Far is it from Virginia and Rochester to Frankfurt? Public Choice as Critical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397-417.

Dryzek, J. S. 2002. "A Pox on Perestroika, A Hex on Hegemony: Toward a Critical Political Science."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oston.

Duverger, M. 1963.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Trans. B. North and R. North. New York: Wiley, Science.

Eakin, E. 2000. "Political Scientists Leading a Revolt, Not Studying On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B. P. 11, C1.

Easton, D. 1953.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Elster, J., ed. 1998. *Deliberative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Epstein, L. and J. Knight. 1997. *The Choices Justices Make*.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vans, P.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arber, D. A. and P. P. Frickey. 1991. *Law and Public Choic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inifter, A. W., ed. 1983.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Finifter, A. W., ed. 1992.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I*.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Fiorina, M. P. 1975. "Formal Models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1: 133-159.

Friedman, M. 1966.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een, D. P. and I. Shapiro. 1994.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eath, J. 2003.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Rational Choice*. The MIT Press.

Hempel, C. 1966.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Hochschild, J. L. 2003. "Editor's Note: Introduction and Observa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1: 1-4.

Kasza, G. J. 2001. "Perestroika: For an Ecumenical Science of Politic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4: 597-599.

Katzenelson, I. and H. V. Milner. 2002.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Katznelson, I. and Barry R. Weingast, eds. 2005. *Preferences and Situations: Points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and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Krehbiel, K. 1991. *Information and Legislative Organization*.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atos, I.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ver, M. and N. Schofield. 1990. *Multiparty Government: The Politics of Coalition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chbach, M. I. 2003. *I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ll of Social Scienc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Lukacs, J. 2004. "The Triumph and Collapse of Liberalism."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51(16): B9.

Mackie, G. 2001. "Is Democracy Impossible?: Riker's Mistaken Accounts of Antebellum Politics." Working papers W91, 19, Jun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Program, Research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http://socpol.anu.edu.au/ papers.html (accessed 2002/2/28).

Mackie, G. 2003. *Democracy Defend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ske, K. and G. Durden. 2003. "The Contributions and Impact of Professor William H. Riker." *Public Choice* 117: 191-220.

McCombs, M. and D. Shaw. 1972.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 176-185.

McKay, D. 2001. "William Riker on Federalism: Sometimes Wrong but More Right than Anyone Else." Paper before the William H. Riker Conference on Constitutions, Voting and Democracy, 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St. Louis, December 7-8. http://cniss.wustl.edu/ Rikerpapers/mckaypaper.html (accessed 2002/2/28).

McKelvey, R. D. 1976. "Intransitivities in Multidimensional Voting Models and Some Implications for Agenda Control."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2: 472-4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cLean, I. 2002. “William H. Riker and the Invention of Heresthe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 535-558.

McLean, I. and C. Bustani. 1999. “Irish Potatoes and British Politics: Interests, Ideology, Heresthetic and the Repeal of the Corn Laws.” *Political Studies* 47(5): 817-836.

Miller, A. H., C. Tien and A. A. Peebler. 1996.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Hall of Fame: Assess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an Evolving Disciplin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29: 73-83.

Miller, D. W. 2001. “Storming the Palace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48(04): A.16.A.

Miller, G. J. 1997. “The Impact of Economics o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5: 1173-1204.

Miller, G. J. 2005.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Principal-Agent Model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8: 203-226.

Moe, T. 1984. “The 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4): 739-777.

Monroe, K. R. 2005.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I. L. and J. A. Oppenheimer. 2004 “Chapter 1: Rational Choice and Politics.” In *Politics from Anarchy to Democracy*, eds. I. L. Morris, J. A. Oppenheimer, and K. E. Solta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36.

Morton, R. B. 1999. *Methods and Models: A Guide t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Formal Model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eller, D. C. 2003. *Public Choice II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agel, J. H. 1993. “Populism, Heresthetics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Richard Seddon and the Art of Majority Rul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2): 139-1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rdeshook, Peter. 1997. *Lessons for Citizens of a New Democracy*. The Locke Institute.

Paine, S. C. 1989. “Persuasion, Manipulation, and Dimens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1(1): 36-49.

Popper, K. 1963.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and Paul.

Protess, D. L. and M. McCombs, eds. 1991. *Agenda Setting: Readings on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Policymaking*. LEA Publishers.

Racfliff, B. 1993. “Liberalism, Populism, and Collective Choic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6(1): 127-142.

Radcliff, B. and E. Wingenbach. 2000. “Preference Aggregation, Functional Pathologies, and Democracy: A Social Choice Defense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2(4): 977-998.

Radnitzky, G. and P. Bernholz. 1986. *Economic Imperialism: The Economic Approach Applied Outside the Field of Economics*. Pwpa Books.

Riker, W. H. 1953.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Riker, W. H. 1955. “The Senate and American Feder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92: 452-469.

Riker, W. H. 1962.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Riker, W. H. 1964. *Federalism: Origin, Operation, Maintenance*. Boston: Little-Brown.

Riker, W. H. 1965. “Theory and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A Review.”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93: 375-380.

Riker, W. H. 1975. “Federalism.”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nd Process*, eds. Fred Greenstein and Nelson Polsby.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93-172.

Riker, W. H. 1976. “The Number of Political Parties: A Reexamination o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uverger's Law." *Comparative Politics* 9: 93-106.

Riker, W. H. 1977. "The Future of a Science of Politic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11: 11-38.

Riker, W. H. 1980. "Implications from the Disequilibrium of Majority Rules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 423-447.

Riker, W. H. 1982. "The Two-Party System and Duverger's Law: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4: 753-766.

Riker, W. H. 1983.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Art of Heresthetics."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ed. A. W. Finifte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

Riker, W. H. 1986. *The Art of Political Manipul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iker, W. H.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Federalism*.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Riker, W. H. 1988. "The Place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Public Choice." *Public Choice* 573: 247-257.

Riker, W. H. 1990. "Political Science and Rational Choice." In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eds. James E. Alt and Kenneth A. Sheps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1-144.

Riker, W. H. 1992a. "Application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31: 5-6.

Riker, W. H. 1992b. "The Entry of Game Theory into Political Science." In *Toward a History of Game Theory*, ed. E. Roy Weintraub.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Riker, W. H. 1992c. "The Justification of Bicamer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31: 81-100.

Riker, W. H. 1992d. "Commentary: The Merits of Bicameralis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12: 166-168.

Riker, W. H. 1993. “Comment on Radcliff’s ‘Liberalism, Populism, and Collective Choic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6(1): 143-149.

Riker, W. H. 1995. “The Experience of Creating Institutions: The Fram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In *Explaining Social Institutions*, eds. Jack Knight and Itai Sene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21-144.

Riker, W. H. 1996. *The Strategy of Rhetoric: Campaigning for American Constitution*, eds. Randall L. Calvert, John Muller, and Rick K. Wils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iker, W. H. and P. C. Ordeshook. 1968. “A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25-43.

Riker, W. H. and P. C. Ordeshook. 1973. *An Introduction to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Saxon, W. 1993. “William H. Riker, 72, Who Used Mathematics to Analyze Politics.” *New York Times* June 29, D.P.23, C5.

Schiemann, J. W. 2000. “Meeting Halfway Between Rochester and Frankfurt: Generative Salience, Focal Points,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1: 1-16.

Shapley, L.S. and M. Shubik. 1954. “A Method for Evalu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a Committee Syst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8: 787-92.

Shepsle, K. A. 1979.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Equilibrium in Multidimensional Voting Mode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27-59.

Shepsle, K. A. 1986.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and Equilibrium Institu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ed. H. Weisenberg. New York: Agathon, 51-81.

Shepsle, K. A. 1992. “Congress Is a ‘They,’ Not an ‘It’: Legislative Intent as Oxymor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1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39-256.

Shepsle, K. A. 2003. “Losers in Politics and How They Sometimes Become Winners: William Riker’s Heresthetic.”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12: 307-315.

Stearns, M. L. 2000. *Constitutional Process: A Social Choice Analysis of Supreme Court Decision Mak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Terchek, R. J. 1984.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and Heresthetics: The Axioms and Assumptions of William Riker.” *Th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r* 14: 43-66.

Tullock, G. 1967. “The General Irrelevance of the General Impossibility Theore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1: 256-270.

Tullock, G. 1981. “Why So Much Stability?” *Public Choice* 372: 189-202.

von Neumann, J. and O. Morgenstern 1944.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eale, A. 1984. “Social Choice versus Populism? An Interpretation of Riker’s Political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4(3): 369-385.

Weimer, D. L. 1992. “Claiming Races, Broiler Contracts, Heresthetics, and Habits- 10 Concepts for Policy Design.” *Policy Sciences* 25(2): 135-159.

Weingast, B. R. 1998.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Civil War: Institutions, Commitment,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n *Analytic Narratives*, eds. R. H. Bates, A. Greif, M. Levi, J-L Rosenthal, and B. R. Weinga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43-198.

Wildavsky, A. 1987. “Choosing Preferences by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s: A Cultural Theory of Preference 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1): 3-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ational Choice, Democratic Institution, and "Heresthetics":

A Review and Appraisal of William H. Riker's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Don-Yun Chen and Samuel S. G. Wu**

Abstract

William Harrison Riker (1920-1993) i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modern political science. Recent calling for "Perestroika"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has demonstrated the dominant but controversial role played by the rational choice school in the academia. As a result, it is urgent for Taiw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to know more about this school.

First, we try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important school by reviewing William H. Riker's research agenda retrospectively. By focusing on rational choice, democratic institution and "heresthetics," we discuss the content, significance, and implications of these three focuses as the hardcore of the rational choice school's research agenda. Second, we find that these research focuses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ree strategies of competing, ignoring and synthesizing, adopted by the school to gain its success in the academia. Lastly, we conclude with suggestions for applying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o the study of politics in Taiwan.

Regardless of its controversial advancement in political science, RCT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alternative approache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research.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in Taiwan's academia, we need to have a basic

* Don-Yun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Taiwan. E-mail: donc@nccu.edu.tw. Samuel S.G. Wu,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Shih Hsin University in Taiw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understanding of its past. There is an important local purpose by reviewing Riker's career contributions through concepts such as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economic studies of politics. In the past, the RCT in Taiwan's political research i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mported pseudo-dialogue," i.e., many criticisms but very few substantive researches. This article can be a meaningful beginning of applying RCT in Taiwanese political research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William H. Riker, Rational Choice Theory,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Heresthetics, Democratic Theories, New Institutionalism,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